

明慧期刊
MINGHUI

天地 苍生

破坏传统

一百年来
中共将传统文化
破坏殆尽



2020年1月

特刊

www.minghui.org



揭露中共罪行

破坏传统

卷首心语

1 在毁灭的边缘救赎

陨落的星辰

2 传统文化的守夜人——陈寅恪

历史档案

- 6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怎么断的？
- 10 钢琴家眼中的“大右派”父亲
- 14 文革首位被打死的女校长
- 17 消灭思想先驱的“一打三反”
- 20 “破四旧”往事

思痛录

- 23 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万变不离其邪

- 26 共产主义“炼狱”中的“宗教自由”

走进真相

- 29 二十一世纪古拉格
——黑监狱里的洗脑术
- 32 “四·二五”和平大上访

毁人不倦

- 34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复兴传统

- 38 神韵
复兴中华传统 引领普世价值

文化，是一国立命之本。欲消灭一个民族，唯消灭其文化，令其语言、书籍、思想、文人、艺术不复存在，她便失去了灵魂，虽存犹亡。

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以天人合一、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因果轮报”为究竟，使华夏民族成为协和万国的礼仪之邦，华夏儿女成为优雅、坚毅、深邃、超然的优秀族群。

然而百年来，中共有计划、一步步完成了摧毁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其完整的路线图清晰可辨：

引入西来共产“幽灵”，鼓吹暴力屠杀，摒弃中华道统。

取缔传统宗教，用中共假神和共产邪教教义，取代中国人信仰的正神、天道。

改造知识分子，打掉文化精英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使承载道统的“士”阶层整体消失。

文革“破四旧”、“现代化旧城改造”，千年文化的物质载体所剩无几。

“仁、义、礼、智、信”遭到无情批判，传统文化的精髓被釜底抽薪。

粗暴“简化”正体汉字；教科书大幅删减古文；马列斗争学说覆

盖文史哲。

至此，中国人与祖宗先贤的联系被割断，文化底蕴消失，悠悠古风不再，成了无根的飘萍，在无知和粗鄙中坠落。

接着，新闻、影视、出版物、会议、标幅、互联网，把人每时每刻浸泡在党的灌输中。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政治洗脑伴随人一生。打造伪艺术、假典型，把“跟党走”包装成“正能量”。腐败治国，让人在贪婪和

相互倾轧中，耗尽最后一点良知。

如今，许多中国人不知普世价值为何物，分不清善恶，以战狼式的仇恨、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挑战全球。礼仪之邦变为十恶毒世，人心糜烂暴虐，社会溃败，国已不国。

中共的目的几乎得逞：从毁灭中华文化，来毁灭中华民族。幸而，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共动不了的，上天在造就她时就埋下了度过困难的种子。保存心底的善良，摆脱中共的控制，回归传统——上天已铺好了救赎之路，就等着每个中国人作出对的选择。



《天地苍生》编辑部

在毁灭的边缘救赎

传统文化的守夜人——陈寅恪

作者 陈奎德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他，以遗世独立的风骨，一人之力与极权政治系统对峙，成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生于光绪 16 年，祖籍江西义宁。祖父陈宝箴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著名诗人。

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13 岁远赴日本留学，20 年间游历东西方，回国时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用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

陈寅恪于 1925 年归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1939 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时，清华校长疑虑，陈寅恪没有文凭，又没有大部头著作，怎么能当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 300 字有价值。”

他讲课时，许多著名教授如梁启超、吴宓、朱自清、冯友兰



陈寅恪

等都来旁听，后人赞他是“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与吕思勉、钱穆、陈垣并称“中国四大史学家”。他在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著述，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堪称泰斗。

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无人能看懂。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

无不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都难以解决，又是他做的确切翻译，才使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气节和操守

1937 年北平沦陷，为避免被日寇汉奸胁迫利用，他出走香港。

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香港，他立即辞职。一家人贫病交加，日本人持重金委任他筹办东方文学院，他断然拒绝。日军又送去重礼，高薪聘他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他不为所动。1942 年春，日方再度请他到占领区上海授课，他再次拒绝。

最终，陈寅恪携妻女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途中，他的私人藏书和手稿遗失甚多，右眼失明。

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有一天，空袭警报响了，大家慌忙逃跑。中文系教授刘文典跑着跑着，忽然想起还有视力差的陈教授，忙带着几个学生跑回来，搀着陈寅恪往外跑，刘一边跑一边大声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返回清华园。

不降志辱身，守护传统文化

陈寅恪曾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自己一生都在实践这一理念。

1948 年底，中共军队逼进北平，傅斯年催请陈寅恪去台湾，陈最终选择留在了广州岭南大学。这把年纪了，他不想离开故土。

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后悔了，大有“痛悔误上贼船，佳期自误”之感。中共发动“思想改造运动”，他无法认同中共政治对学术自由的践踏。

1952 年院系调整，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最后二十年。

1953 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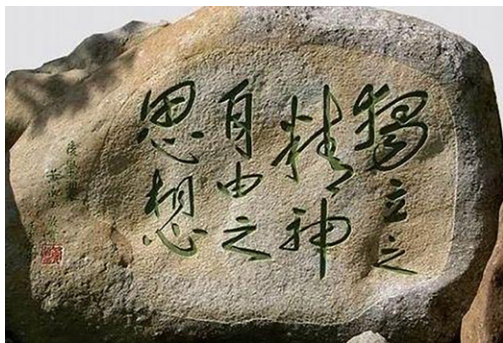


陈寅恪一家在香港

史研究所。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所长。为此，特派陈原来喜爱的学生汪篈前去游说。

汪篈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他自恃有“尚方宝剑”，以党员“教育开导的口吻”，与先生严肃谈话。这让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篈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几天后，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最终答应与汪做一次长谈。

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王国维墓志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二天一早，由陈寅恪口述，夫人唐筼执笔，写了回信《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的惊人之句，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项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信由汪篈带回北京。有学生劝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助手黄萱问先生：“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他答道：“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集体臣服于中共意识形态，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足见陈寅恪的胆识和风骨。

去北京赴任之事不了了之。到1958年，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是“假权威”、“伪科学”。他不再开课，要求退休。

从此，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中，他独守清静，闭门著书，誓不与之同流合污。正如老朋友吴宓在日记里形容他的“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

人所难及”。

晚年，陈寅恪在双目失明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完成了两本巨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形成了以诗与小说证史的独特治史方法，轰动海外。

“思想不自由，勿宁死”

1966年文革来临，中山大学掀起批判陈寅恪的狂潮，他的助手被赶走，护士们被撤走，女儿们怕受到牵连，不敢来看望；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大字报糊到他家里、衣柜、床头和衣服上。

家被多次抄，夫人遭到毒打。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他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夫人先祖遗留的首饰被劫走。

为了验证“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造反派将他拖下病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造反派还在陈家四周挂上高音喇叭，甚至将喇叭绑到床头播放。夫妇俩当即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由于他“死不悔改”，1969年初被勒令搬出已经住了16年的家，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

此时他已衰弱得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他一语不发，眼角不断有泪流出。

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仍被逼作口头交代，他留下“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最后遗言。10月7日晨，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享年79岁。

45天后，贤妻唐筼亦追随丈夫而去。在台湾的蒋介石闻讯后，水杯都摔掉了，流着泪说：惨无人道！

1980年，由其弟子整理的《陈寅恪文集》问世，这套文集是按照先生生前的托付，以繁体字、竖排出版的。

天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是怎么断的？

——从延安整风到“思想改造”运动

作者 丁抒 唐文 大纪元 / 编辑 希金

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士”阶层，在中国是怎样消失的？

今天的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难有担当？

这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初次尝到恐怖和战栗的滋味

1937 ~ 1938 年，成千上万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相信了中共“北上抗日”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谎言，经过艰难曲折来到延安。但是，现实使他们很

快感到失望。

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为代表。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共的等级制度，及毛泽东的专制思想，并把尖锐的观点贴到墙报上。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中央研究院调查发现，对王实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 95%”。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回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于是，整风运动的对象从党内高层转向大批知识分子，又同阶级斗争、肃反联系起来，演变成一场大清洗。

知识分子被要求参加一场场斗争会。为逼迫人们承认自己是“特务”，酷刑多达 24 种。许多人精神失常。许多人不堪其辱，选择了自杀。不少特务嫌疑者被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

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被打成“特务”的占 70%。行政学院除一人外，教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有一半是“特务”。抗日军政大学排以上的干部 57% 是“特务”。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了延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整体被打入另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在 1942 年 8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延安的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王实味被宣布为托派分子、兼职特务，逮捕入狱。1947 年中共撤离延安时，他被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处决：大砍刀从身后乱刀百次，尸体丢弃于一口枯井中。

知识分子尝到了恐怖和战栗的滋味。1944 年 6 月，记者访问延安时发现：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人们脱胎换骨了，“同一的问题，问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

党文化的源头

1942 年 5 月 2 日，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百余人参加。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高华将它概括成五层意思：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要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2、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不允许描写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的东西；4、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5、反对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座谈会上胡风提出：文艺还应讲究文化传统。但他的观点不可能被中共接受。毛泽东的报告对什么是中共党文化、如何贯穿和体现党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



1951 年，毛泽东亲自提笔批判《武训传》，拉开了中共建政后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

中共要把党的绝对权力贯彻到所有领域，任何可能会抵消这个权威的东西，包括传统文化，必将摧毁之。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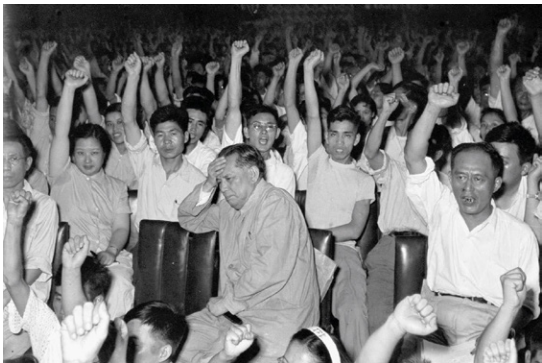
中共刚一窃政，就迫不及待对知识分子开始了一波波改造，要把他们改造成绝对服从党的意志、主动歌颂党的“伟光正”、帮助党给普罗大众洗脑的机器。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

大量非体制内知名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表态与过去划清界线的文章见诸报端，如：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

延安整风那一套又到全国重演一遍：强制学习、坦白交代历史、自我检讨、批斗、人人过关，连高中生都不放过。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早年投身民主运动，多年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其历史人所周知，却被追查有“思想暗流”，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越检讨，越说不清，被批斗得痛哭流涕。



“大右派”章伯钧批斗大会现场

被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从美国回国的华罗庚，尽其所有地交代，最后因为还保留着出国护照未加焚毁，遭到无休止批判，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留后路”的打算。他有口难辩，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因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有学者描述：“大会批斗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台下的同事、学生“指着鼻子骂你”，不仅尊师重道的传统丧失殆尽，个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更令人恐怖的是，中共还有意将“思想改造”与朝鲜战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政治问题，就面临逮捕或劳改等暴力镇压！

“士”阶层整体消失

一场场血腥运动让知识分子目睹了共产党的凶残，许多人的脊梁骨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

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回忆：“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

胡适看了金岳霖在运动中写的检查后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无休止地自我矮化、自我践踏，使知识分子逐步丧失独立本性和独立思考能力，也就不再有

成果问世。有的人改了行，如北大的沈从文改搞文物。大多数人奉行“沉默是金”。金岳霖的学生说：“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学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成的。”沈从文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传统的“士”阶层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和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只要鸟儿在笼子里唱颂歌

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但是到1957年6月，一场更大规模的清洗——反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酷烈卷土重来。

其实，中共的“双百方针”，是要鸟儿在笼子里多唱颂歌，决不许鸟儿钻出笼子的。

几十年来，造成几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沦为“犬儒”、“精致的利己者”，只会为中共站台背书，独立敢言者成为稀有之物。

中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鸟儿在笼子里多唱颂歌，决不许鸟儿钻出笼子的。几十年来，造成几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沦为“犬儒”、“精致的利己者”。

钢琴家眼中的“大右派”父亲

佚名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1982年6月的某天，储望华离开北京赴澳洲留学，临行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校办主任急匆匆跑来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没想到在即将离开故土的这一刻，储望华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前言

现年77岁、定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最小的儿子。这位儒雅的白发学者是著名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不仅被国内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成为音乐院校常用教材和曲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打击右派的信号。到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全国有55万人被划分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中的所谓“极右分子”，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在北京的颐和园附近，早起散步的人们，经常看到树上吊着死人。“右派”分子家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受尽凌辱，遭受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储安平1958年1月被划为“右派”，1966年9月失踪。在储望华的回忆中，关于父亲的影像是支离破碎的，可是那段父子情深的历史却永远无法忘怀。

以下是储望华关于父亲的回忆（因篇幅有限，有删改）。



储望华



储安平和他的两个孩子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

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

几个月后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

父亲失踪了。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就从后院翻墙而逃，

跑到数十里外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水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

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

9月20日，我得知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要在全中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十年

1957年4月1日，父亲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言

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

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看了之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自从“反右”以后，父亲虽然写过检查、



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1949年，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

1946年他创办《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

新政权建立后不久，《观察》复刊为《新观察》，但其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人生

父亲一直支持我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

附中。

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班里同学在班会里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儿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

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我的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迫于压力，校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的女朋友是钢琴系的，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

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

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等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经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正在演奏的储望华

文革首位被打死的女校长

作者 高天韵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1966年8月5日15点40分，她的手表停了。不久，她的生命，也停了，就在那个下午。

死亡前奏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在那里她已经工作了17年。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都是该校学生。

1966年3月，学校告诉学生，若发生地震，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不置可否。文革开始后，这成了卞仲耘“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6月22日，卞仲耘“揭发批判大会”上，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群情激愤。卞仲耘被押在台上，戴高帽、罚跪、反捆双手、拳打脚踢。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

她的女学生们，花样年华，剪了辫子，穿上军装，扎起皮带，展现的却是魔鬼一般狰狞的面目。

8月5日

早上，卞仲耘坐在床边，对文



被打死的卞仲耘和她的两个孩子

夫王晶垚说，她要去学校了。夫妻对望着，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握了握手。

批斗于下午2点开始。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

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伸手捂肚子，牛皮靴准确迅速地踢在了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

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般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棒，嘻嘻哈哈狂笑。

红卫兵们命令卞仲耘等人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搬回去，劳动改造。图书资料员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

同时被批斗的副校长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回忆：“一辆平板车推过来……，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已没有反应，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她们是我倾注满腔

“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

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直到晚上7点多，卞仲耘才被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无言的照相机

晚9点左右，王晶垚接到学校电话，说卞仲耘受伤了，已送到邮电医院。在那里，一家人看到了遗体：卞仲耘头上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遍体鳞伤，脸部、双腿、两脚浮肿。

在医院，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拒绝家属解剖尸体的要求，想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最后，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填写了“死因不明”。

王晶垚透露，当天晚上，邓楠、邓榕来到他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因高血压病死亡，不能说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买

了一架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妻子的尸体，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他也摄下了孩子们在母亲身旁哭泣，还有尸体火化时，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缕青烟。他觉得，那是妻子的冤魂。

痛苦的回忆，全部收藏在那个旧皮箱里：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依稀可见用墨写的“打倒”二字，一条皱巴巴沾着失禁的粪便的内裤，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

还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里面是妻子的一缕头发和一块手表，手表的指针停在3点40分。

《我虽死去》

1973年，卞仲耘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王晶珪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但是无果。

1979年4月，王晶珪向北京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且控告了校外人员袁

淑娥。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1989年12月25日，全国最高检决定，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2006年，大陆独立电影人胡杰走访了王晶珪老先生，聚焦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制作出纪录片《我虽死去》。胡杰说，在编辑电影过程中，有安全部门到家里正式通知他，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珪讲过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文革，至今仍是中共的禁忌话题，《我虽死去》也一直在大陆被禁播，不过在网上传播甚广。纪录片揭示的真相震撼了观众，更引起了人们对中共邪性本质的深深思索。



2006年1月27日，85岁的王晶珪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黯然神伤。

消灭思想先驱的“一打三反”

佚名 大纪元 / 编辑 张华

文革中有几次运动高潮，如“红八月”杀的是“出身不好”的人，而“一打三反”是要消灭有“反动思想”的人。



1967年，遇罗克刑前的最后留影。

“一打三反”的打击对象

1971年“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就是中共认为有“反动思想”或“反动言论”的人。中共规定，对这种人，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判刑处决。就是说，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到你灵魂最深处挖掘可以判处你死刑的证据。

各地政府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每次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绝大多数是中共暴政的抗争者，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谴责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此外，还有大批被害者，是各地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而凑数的无辜冤魂。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

青年工人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等文章，反对以出身、成分为标准迫害人而获罪。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

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1964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

她被关进北京安定精神病院，在“一打三反”中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时，刽子手们为防止她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的途中。

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人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这是周恩来遵照共产国际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

拒绝沉默的人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因讲述农民生活困苦，1960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回老家安徽无为县（无为县大饥荒时饿死了30多万人）。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

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中被中共杀害。

1972年2月，宁夏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13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其中，中学毕业生吴述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空白处，写下“放屁”二字。北京农业大学1970届毕业生鲁志立，撰写了一篇讨伐中共暴政的檄文《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

吴述樟和鲁志立被判处死刑。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

被割断，以免他呼喊“反动口号”。

一句老实话的代价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1970年6月被枪毙。

巴基斯坦外宾送给毛泽东芒果，毛转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工宣队又把它分送给其他单位。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接送芒果、感恩戴德的旋风。送不过来，就用蜡制芒果代替。

四川雅安汉源县富林镇老牙医韩光第，看见玻璃罩里的金黄

色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公安机关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他，一年多后竟判处死刑！

韩光第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赶下乡，老伴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也去世了。

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打三反”犹如严打，极其恐怖，说错话就关就杀，成了文革的杀人高潮之一。中共将杀人权下放给基层以鼓励杀人，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其残酷可以和文革中的另一场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比肩。

仅复旦大学等6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5人被逼自杀，3人被逼疯。

还有不少人遭到灭门处决。如南京的李立荣和他60岁的母亲林舜英，北京二十五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都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丁抒博士认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200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这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10万以上。

“破四旧”往事

作者 玉清心 林辉 刘晓 大纪元 / 编辑 张华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开始从北京向全国蔓延。

马连良被抄家时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

马连良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为“四大须生”之首,文革中成为京剧界一号黑帮分子。

马连良故居是座深宅大院,当年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一度成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西纠”总部。马连良家很多古董古玩都被砸毁。红卫兵抄家时,发现马连良手里还攥着个翡翠鼻烟壶,栩栩如生的绘画都是从里面雕刻成的。马连良央求他们:“别毁了它,这是稀世珍宝,留着它吧,捐献给国家。”红卫兵夺过来看了看,“什么他妈的破玩意!”翡翠鼻烟壶被摔得粉碎。

马连良当即瘫倒在地,不省人事。他已是心脏病晚期,造反派不许他去治病。连续数月地抄家和揪斗。



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在“牛棚”排队买饭时,撒开手杖和饭碗,仰天一跤……三天后,一代宗师气绝身亡,时年66岁。之后他被强行火化,连土葬在回民公墓都不准。

北京人自己“破四旧”的经历

唐仕在给大纪元的投书中有段记载:乾隆皇上曾赐给她祖上一块“斗方”,是用朱砂写的“福”字。文革抄家,北京人为免遭血光之灾,各家各户自己“破四旧”,家里凡沾有“四旧”嫌疑的物件,统统处理掉,包括家谱、结婚照。

“斗方”成了大家一块心病,最后由二婶动手,把这镇宅之宝化成纸浆,在后院挖个坑埋了。

父亲把爷爷穿着官袍的老照片也烧了。爷爷官服前襟有个“补子”的图案,一看就知道他是大清朝的四品官吏。

书法家沈尹默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自己的书法作品、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文革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散存在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被销毁无计其数!

佛道圣地无数文物销毁殆尽

河南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被称作佛教“祖庭”和“释源”。

“破四旧”之风刮到这里时,白马寺生产大队书记带领农民,将辽代十八罗汉泥塑、2000多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玉马等稀世珍宝破坏,寺庙差点烧掉。

1972年,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掩盖文革罪恶,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

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寿康宫里的佛像等运到白马寺,永久保存在那里。因此,现今的白马寺多是明清文物。

经过“破四旧”,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五官无一完好。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

陕西2500年前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道士们被遣散还俗。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为何拒回大陆?

生于1919年的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在1949年离开大陆后,直至2008年终老台湾,都没再回



文革中惨遭破坏的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1966年，山东曲阜，红卫兵砸碎孔府匾额。

曲阜和大陆。原因何在？

1966年文革发动后，毛泽东的干将康生把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找来，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他把图交给谭，并撂下一句话：“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200多人来到曲阜，高喊口号“造孔家店的反”，烧毁古书2700多册，字画900多轴，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多件，珍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孔德成的父亲孔令贻与陶氏、王氏（孔德成生母）的合葬墓，曝尸数日后焚毁。

掘开孔子墓穴时，红卫兵们动用了雷管和炸药。掘出孔子骨

骸示众后，将其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断成几截。

破坏孔子墓、孔庙、孔林，这是当年侵华日军都没干过的恶事。

孔德成的孙女回忆说：“有一天，我看到爷爷在看报，突然冒出一句：‘红卫兵连俺娘的坟都给挖了。’然后长叹一声‘唉……’。”

文革后，中共又修复孔庙、孔林、孔子墓，开始祭孔，可那多是商业化和党文化的包装，孔家的嫡系后裔孔德成拒绝承认，认为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

1990年代，曲阜当地政府代表团到台湾，拜访了孔德成先生，还向他献上包装精美的“孔府家酒”。孔德成瞥了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孔家没有这种酒。”

结语

文革中，国宝级文物失去知多少？比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劫毁《永乐大典》要广泛、彻底得多，已无法统计。

“破四旧”表面是学生的“胡闹”，实则是中共有意操纵的暴力行为。文物、古迹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破四旧”将其破坏殆尽，其蕴含的文化道德内涵也随之消失，传统文化被连根拔除。天

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杨沫

作者 刘晓 大纪元 / 编辑 申辉

古人讲，男子要有担当，对妻子负责；女子要相夫教子，温良贤淑，共同达到“齐家”的和谐状态。一个温良、有爱心、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孩子一生受益无穷。然而，中共扭曲了人性，将女人变得冷漠、强势，完全丧失了传统女性的美德。

认为孩子是累赘

据说，中共“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的原型，正是作家杨沫自己。

作家老鬼（本名马波）在《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文中描述母亲“有严重的欠缺”，杨沫生前也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1949年刚进北京时杨沫一家的合影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为避免敌人发现，革命的母亲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给杨沫留下深刻印象：为了革命，可以牺牲孩子。

杨沫曾生下5个孩子，因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孩子长大后，周末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她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不管孩子。她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

抚养孩子中冷漠的杨沫

十几岁的徐然因住宿学校不习惯，一次偷偷溜了出来，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里。杨沫看到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荊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手被打破流血。第二天，杨沫就找人将女儿送回了学校。

对于马波，从四年级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杨沫一次都没去过。孩子长大离家远行，杨沫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马波从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但马波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马波小时候生病肚子疼，杨沫表现得极为冷淡，无动于衷。直到几天后，马波已奄奄一息，她才让哥哥带着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马波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杨沫和丈夫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都放在他们的屋里，只供自己享用。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干部，才可有这种待遇，孩子不配染指。他们从不给孩子粮票。马波和哥哥一直吃不饱，哥哥曾在清华大学饿昏过。马波心痛地写道：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马波认为，与长期以来中共将人性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大加讨伐有关。全社会提倡“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文革中与孩子的矛盾加剧

文革开始后，杨沫和丈夫成了审查对象，多年受冷漠加上中共极左思想影响，让马波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

后来，马波在内蒙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监督改造。他曾写信向母亲求援，但常常是马波写四五封信，杨沫才回一封，还总是要他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当马波看到身边的知青，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时，别提多羡慕了。

姐姐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杨沫也置之不理，最后是徐然将其接回，才恢复了正常。

父母因怀疑马波的哥哥偷了埋在地下的1000块钱，大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顶撞的杨沫立

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因哥哥没有去处，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却与其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却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此后，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使右臂骨折，举目无亲，给父母写信，但杨沫和丈夫依旧置之不理，直到5年后才恢复来往。

杨沫与亲戚的关系也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冰冷，不重亲情，是杨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马波认为，这与长期以来中共将人性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大加讨伐有关。冰心就是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

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杨沫，就要表现得更为极端，认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

在马波看来，扭曲了母亲的人性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杨沫晚年的忏悔

晚年，杨沫再婚。在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杨沫也恢复了亲情。她说，这时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晚年的杨沫加倍弥补对孩子的亏欠。她总是挂念着几个孩子，时不时地写信或通电话，问寒问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

此时的马波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这样回归人性的“慈母”来的太晚了。



晚年杨沫和儿子马波

共产主义 “炼狱”中的 “宗教自由”

编辑 李念

中共建政以来，
“灭佛”从未间断。

据 2019 年媒体报道，中共官员称：“烧香拜佛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就是不相信共产党。”超过 10 米的佛像要拆除，谁阻止就要抓去坐牢，谁不让拆就按扫黑除恶处理。其实，中共建政以来，“灭佛”从未间断。

1949 年后的“三教齐灭”

中共建政后，为了全面推行“无神论”意识形态，对宗教展开大规模镇压。中共还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成员到政府登记，悔过自新，违者严惩。

1950 年 9 月，中共扶植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人员算国家工作人员，按行政级别拿工资，出国由统战部出资，但得按照中共的意图解释



1964 年，十世班禅喇嘛因直言批评中共治藏政策而遭受批斗侮辱。

教义。一个好友问“三自教会”的创办人、中共政协常委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这位好友被中共关进监狱 20 多年，受尽毒打欺凌。

1958 年以后，中共开展“献堂献庙”运动。上海的教堂由 208 所减少到 23 所，北京的 64 所合并为 4 所。

“三自”还开展控诉运动，长期隐藏在基督教会内的地下党员李储文积极控诉“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另一位死在狱中。

不愿加入“三自”教会和天



1966 年 8 月 24 日，红卫兵捣毁了哈尔滨极乐寺，逼迫和尚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标语。

主教爱国教会的宗教人士全被打成反革命。1952 年 4 月 10 日，倪柝声牧师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1956 年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被判刑 15 年，关押至死。其妻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多次被鞭打受伤，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1954 年 9 月，王明道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三自”，被打成“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王入狱 22 年，其妻获刑 15 年，加 4 年劳动改造。

1955 年中共镇压不与其合作的上海教区，将龚品梅主教和 30 多名神父、教友共 183 人逮捕入狱。

据不完全统计，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杀害的，竟达 8840 人，因而遭劳改的达 39200 人；被冠上“反革命”

罪名而杀害的达 2450 人，因而遭劳改的达 24800 人。

迫害令人发指

1951 年春，受慈禧、蒋介石尊敬的虚云法师拟在云门山大觉寺传戒，中共民兵百余人包围寺院，以该寺隐匿反革命分子、窝藏军械及金银为由，囚禁 26 名僧人，搜查全寺，逼虚云法师交出黄金白银枪械。虚云法师说没有，竟被毒打至头面血流，肋骨折断。

1951 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内决定结婚！南昌拆除三个寺庙，合建一个“南海行宫”，男女僧尼同寺修行。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抗美援朝”期间，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杀人！

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

“文革”中，对宗教的镇压登峰造极。无数寺庙、佛像被捣毁，无数出家人被迫还俗。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班禅喇嘛“吃

大便”，命令哈尔滨极乐寺三位僧人举著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广州有位牧师被红卫兵拉去公审，要他当众说“打倒上帝”，他不肯，红卫兵便将烧红的铁盒烙在他头上。

金陵协和神学院有个教职员对党表忠心，竟给耶稣罗列了 70 多条“罪状”。

被商业化和被染红的寺院

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清修的宗教场所变成旅游胜地，靠收香火钱、门票钱敛财；和尚不仅可以结婚，还可以包二奶；待遇类比中共干部的行政级别，什么“局级方丈”“处级阿訇”“科级神父”等。宗教被商业化，净土难寻。

中共还培植红色宗教信徒，用中共思想渗透宗教。2017 年 12 月，在海南省佛教协会学习十九大精神培训班上，海南省佛教协会的负责人称“共产党就是现世的佛菩萨”，他已经手抄了 3 遍十九大报告，还准备再抄 10 遍。

陕西省汉中市一佛寺住持每月初一、十五，不再给香客讲佛学，而是宣讲中共国家政策。

2018 年宗教进一步“中共化”。

自 5 月起，当局强制各地宗教场所，必须在显著位置悬挂五星红旗。2014 年以来，中共当局强拆了近 2000 个十字架。

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部长会议谴责，中共一直对少数民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法轮功成员施行酷刑、身体虐待、任意拘捕、判刑、骚扰。

万变不离其邪

1999 年，时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表示，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所以，无论是取缔迫害、商业化、红色强制渗透，万变不离其邪，都是为了使人类远离神，最终走向败坏和毁灭。

天



今日的和尚唱红歌

二十一
世纪
古拉格

黑监狱里的洗脑术

编辑 子规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视频截图）

中共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或“法制教育学校”，实质就是“洗脑班”，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反法律的地方。它对外谎称对法轮功学员“教育转化”“春风化雨”，其实是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黑监狱。除了使用暴力，还有更隐蔽、更邪恶的精神虐杀术。这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也被广泛使用，但在国际社会和大陆却很少有人知道。

与世隔绝的日子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用来关押市公安局绑架的法轮功“重点人物”。每个人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房间。两个营的男武警、两个中队的女武警，24 小时轮班看押。

清华大学的王为宇博士，在此经历了长达 10-11 个小时的电刑，从晚 6 点到第二天天亮。

警察拿来一捆电棍，直接放在他脖子上，“五个人按住我，用脚踩在我的头上，不停放电”，直到电棍的电全部放完。期间警察还大笑，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我们就有办法了。

电棍没电了，他们还不过瘾，找来电线接在墙上的 220V 电压上，用电棍尖锐的两极直接插到他背上的肉里去放电。直到他昏迷，生命垂危。

如果你死在那里，或者被逼疯，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有人出来作证，无声无息，自生自灭。还会说你是病死的，或自杀身亡。而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一关就是数月、半年。

攻心术

“洗脑”是洗脑班的核心部份。

2001 年 8 月 5 日，李桂平是



王为宇在美国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视频截图）

第一个被劫持到这里的。当时她的孩子刚刚出生九个月，还在哺乳期，半年后，她却被非法判刑12年。

劳教所警察李继荣负责给她洗脑。李桂平总有奶水流出，李继荣残忍地说：“孩子想妈时，才会流奶水，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哭呢。”她还拿来李桂平未满周岁儿子的照片，企图用“亲情”逼迫她就范。李桂平没有上当。李继荣恼羞成怒，指使打手暴打她。

在高压下违心写了“保证书”的人，接着被逼迫写“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反复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材料；无休止的文革式“揭批会”、写思想汇报；为验明其是真的转化，被强迫喝酒、骂人、打人、给别人洗脑。

从杀心到杀身

对拒不“转化”的修炼者进行严管，私设酷刑室，单独关押用刑。

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美术教师秦尉，2004年在“北京市法培中心”经历了一种特殊的酷刑：每当夜晚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装在屋子天花板一角的一个装置发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钟或三、五分钟就尖叫一次，整夜不停，使秦尉心脏乱跳，手脚冰凉，难受之极。

白天，警察会来检测他心脏的变化，心电图、彩超都用上了，一天两次，五个月中天天如此。很快，秦尉的心脏就出现了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等各种症状。

不准睡觉

只要修炼者一天不转化，就不准睡觉。

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的《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恶意将少女王博和她的父亲树立成家喻户晓的“转化典型”。

事后王博的父亲王新中揭露了劳教所里的转化内幕：“它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

王新中说：“我迷迷糊糊神智不清，就这样被所谓的‘转化’了。这绝不是我的本愿。这不是我的真实思想，是对我的精神迫害。”

性迫害导致精神失常

年轻貌美的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在经过一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10个月连续3个“洗脑班”的酷刑、洗脑、游街示众、不让睡觉等折磨后，2004年4月2日回到家中时，已经精神失常。出现幻觉幻听，不分昼夜地哭、笑、骂人、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经常用手捂住头部惊恐地喊叫：“你们要强奸我吗？”据悉，祝霞在郫县洗脑班期间，在被药物迫害得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被两个恶徒多次强奸。

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于2003年11月23日返回日本后，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在北



被迫害前后的祝霞

京一个洗脑班上，一位女学员被脱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她当时就精神失常了，被放下来后光着身子就往外跑。

“转化率”：万恶之源

在江泽民集团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以对法轮功的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2001年，罗干在全国综治会议上提出，迫害法轮功实行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

大大小小的洗脑班一共有多少呢？数不清。在明慧网上能收集到的有明确所在地信息的，就多达3640个。

只有邪教才会强迫人们放弃除它以外的一切信仰。中共正是这样一个邪教，七十年来，它对正信的迫害从未停止。

“四·二五” 和平大上访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他们的和平、理性震惊世界，国际舆论称赞“四·二五”是“最和平理性的上访”。

上访是为了他人了解真相

1999年4月11日，何祚麻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天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反映实情。4月23日，天津公安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并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从4月24日晚至25日早上，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警察把人流导向中南海，安排了所谓“围攻中南海”。

法轮功学员是抱着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心愿来上访的。假如“真、善、忍”被认定为“坏事”，那假、恶、暴不就成了社会提倡的标准



历史图片：“四·二五”大上访

吗？一定要把人从谎言中救出来。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了中南海

目前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先生，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到：

“4月25日早晨七点半我到了府右街北口。附近街道两边和小区里站了许多学员……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秩序井然。

“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我回头一看，朱镕基总理和几个工作人员正走出对面的大门，朝我们走来。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一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问。

“‘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这时大家纷纷举手，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朱镕基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转身带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事后才知道是罗干给扣押了）。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说完他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另外两位学员一个是北大某

电脑公司的女职员，一位是下岗工人。三人讲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四位信访办官员边听边记录。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时，我们把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警察说：这就是德！

晚上九点多，学员得知朱总理将会妥善处理这事，就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的烟头，各自回家。

在场的一位女警察很受感动，她说从没见过表现这么好的上访人，几万人在那呆了十多个小时，走后地上干干净净的。“这就是德！看看人家多讲道德！”

国际社会评价“四·二五”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上访”。

然而，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持续20年的群体灭绝性迫害。 天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作者 袁斌 凌晓辉等 大纪元 新唐人 / 编辑 陈忠

中共篡政的后三十年，尤其江泽民执政期间，以腐败作为治国方略，激起人“一切向钱看”的欲望，中共高官家族带头“闷声发大财”，结果出现制度性大规模腐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

中共权贵家族富可敌国

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进入 1980 年代，中共“红二代”、“官二代”被中共权贵集团选出来经营国有集团企业，这些家族很快瓜分、把持了国民经济命脉。

有美国媒体追踪，26 名中共元老后代掌管总资产 1.6 万亿美元国营公司，这超过中国年经济产出的 1/5。

在 1990 年代，他们进军房地产以及煤炭钢铁产业。今天他们的孙子辈进入国际金融领域，成了私募投资玩家。

江泽民家族在海内外持有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 5000 亿美元，位居世界隐形首富。江的儿子江绵恒垄断了中国电信行业。江的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的海外资产包括基金、股票、银行、信托、能源股份、科技股份、黄

金期货、房地产、海外控股公司、离岸公司等。

中共权贵家族盗取国家巨额财富占为私有，如今已富可敌国。他们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已达到天文数字。维基解密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 5000 个账户，2/3 是中央级官员。部级以上和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江泽民集团瓜分中国经济内幕》

目前，虽然中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但阻止不了资金外流，因为钱都控制在中共新老权贵家族手中。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核心。

大规模的官德沦丧

上梁不正下梁歪。绝大多数中共官员没有精神信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他们唯一的信仰和动力，官员群体道德沦丧：

1、跑官、买官、卖官十分普遍。

2、受贿、索贿，贪污，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近几年，从贪官家中搜出的黄金，动辄几十吨上百吨；搜出的现金能点坏数台验钞机。

3、贪色，淫乱。据《江泽民

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带头搞情妇。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莫不如此。中共军队大搞黄色产业。中央电视台已经变成中共政治局的“后宫”。

中国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中共官员腐败 60% 以上跟包“二奶”有关，被查处的贪官中 95% 有情妇。

4、滥用权力，法为私器。民众因上访、批评或检举官员而获罪；敢于揭露真相的记者遭到失去公职、被失踪、跨省抓捕等报复，浙江、内蒙、辽宁均发生过此类事件。

官员动用黑恶势力充当打手已屡见不鲜，甚至雇凶暗杀。

5、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编造虚假的统计数字、说谎话已成为官场的基本技能。

6、官商勾结、官学勾结的利益交换。浏览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都拥有博士、硕士头衔，但大多数是造假，找人代写论文，或学术机构为取得可观的科研经费，主动巴结赠送的学位。

总之，如今的中共官场，许多人人格低下、言行龌龊，早已突破了文明底线。



北京秀水街打出的横幅

各行各业成了疯狂的赚钱机器

中共率先放纵欲望，人心都被带坏了，导致全国黄赌毒泛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豆腐渣工程、假文凭“产业链”等等大行其道。

教育和医疗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良心。2015年6月1日，西安长安区农民周海元的妻子生下小女儿6天了，下身一直在出血，必须马上输血，需要510元费用，而家属身上只有500元，只能打电话找人送来。待家属交完钱后，医院表示，该院没有血库，必须到西安市中心血站调血。一番折腾，两个小时过去了，周妻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只因为10元钱，就延误救治，草菅人命！这无疑成了当今社会医德沦丧的最耻辱标本。

众所周知，“收红包”已成为医患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大城市医院高昂的药费、体检费、住院费，成为压在患者身上的大山，导致贫困人群看不起病，只能在家等死；医生被誉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

使。可是现在的大陆，许多医生唯利是图，医院沦为疯狂的赚钱机器，造成医疗品质下降、患者负担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中国公民诚信排名倒数第一

美国《科学》杂志2019年6月公布了一份报告：研究人员在全球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进行调查，他们在官方和私人机构交付了超过17000个“丢失”的钱包，然后在100天内统计有多少人通过预留的联系方式，将钱包返还给“失主”。

结果显示，排在前五名的是瑞士、挪威、荷兰、丹麦、瑞典，有70~80%的人联系失主，中国则在诚信排名最末。



2011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

一桩桩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触目惊心

2011年10月13日，两岁幼童小悦悦正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独自玩耍，一辆面包车将她撞倒，右侧车轮从她胯部碾过。司机加大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她身上碾过。

小悦悦尚有呼吸，先后共有18人从她身边走过，竟无人援手相救，哪怕是打个求助电话。一辆小型货柜车开过来，再次从她身上碾过。当小悦悦被送到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而离世。

这件事引发了舆论狂潮，人们问：“如今的中国，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碾没人救，中华民族怎么了？”

这类事件时常见诸于报端。中国人何以对生命如此冷漠？

还有比冷漠更残忍的。北大经济学院吴谢宇杀死亲生母亲案震惊大陆。红黄蓝虐童案，弱者屠童案，亲友相互残杀的案件层出不穷。社会的道德已跌破正常人性的底线，中华民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谁是真正的推手？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禁止对

中共奉“无神论”为国教，不断批判普世价值，破坏五千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迫害信奉“真、善、忍”的好人，颠倒和毁灭了中国人的善恶价值观。

神的信仰，奉“无神论”为国教，不断批判普世价值，破坏传统文化，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一切颠倒和毁灭了中国人的善恶价值观。

中共一贯教唆亲友之间、师生之间相互揭发告密，致使亲人反目，师生成仇，朋友失信。至今，中共媒体还常常以“革命”的名义，赞美所谓“大义灭亲”，如“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共鼓吹的“大英雄”王秀松，他的事迹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如此悖逆人伦，令人不寒而栗。

凡抵制暴政者，中共就残酷迫害。它要让人们中共什么样的流氓恶行、荼毒虐杀，都从恐惧到习以为常，越来越麻木，这正好为它所利用。

中共“把人变成非人，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摘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神韻晚會 2020 SHEN YUN



神韻

复兴中华传统 引领普世价值

文章来源 正见网 / 编辑 山河

神 韵艺术团，是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中国古典舞表演团队。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5月12日，神韵六大艺术团同步全球巡回演出，共在150个城市上演了近670场演出，

神韵莅临，盛况频现：演出爆满加座、一票难求！

神韵是修炼人的艺术团体，以“真、善、忍”为准则，在提高技艺的同时，提升道德和精神境界。神韵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出于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为着同一个愿望：复兴真正中华神传文化并向全世界传播！

罗宇：神韵唤起思考，犹如神在关照

罗瑞卿次子，今年71岁的罗宇，曾任职中共总参谋部，大校军衔，后因反对中共六四屠杀而离开大陆，旅居美国。

看过神韵艺术团在费城音乐学院剧院的演出后，罗宇由衷赞叹说：“这不可思议啊！”脱离中共后，他对父辈创建的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及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进行了

反思。看到神韵在舞台上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唤起了他曾经在精神层面上有过的许多思考。

罗宇深有感触，因为他也经历过一段从无神论到信神的回归。他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从六四开始以后，我就逐渐变成了有神论。在人之外有一个高于人的，你说是神吧，或者你说是别的。他在注视着你，在关照着您。我自己就觉得，神在关照着您。”





前中情局高官：要了解中国文化，最好是看神韵

Michael Sulick 先生是一位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在北卡罗莱纳州首府看了神韵演出，他说：“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来自媒体，而且新闻中很多都是关于中共和现今的中国，但是那些显然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我认为，最好是看这里（神韵）所展现的，未含共产党的宣传。”

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神韵正改变世界

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兼院长 David Di Chiera 先生是全国唯一一个独立协作创立并领导两个歌剧

院的总监。

在观看了神韵在底特律歌剧院的演出后，他赞叹地说：“任何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一定对世界是有影响的，这种改变是不能量化的，但是你知道她（神韵）在改变着世界。”

意大利公主：获得了心灵的净化与提升

意大利前王室公主维多利亚·科隆纳·迪·斯蒂利亚诺，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佛罗伦萨威尔第剧院的演出。这位学习过绘画、歌剧表演的多才多艺的公主，走出剧院时有许多感受。

她激动地说：“神韵演出是精

彩绝伦的艺术盛典，不仅视听无与伦比，也带来心灵的触动与震撼，很多观众表示不仅从演出中学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也获得心灵上的净化与提升。”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不要错过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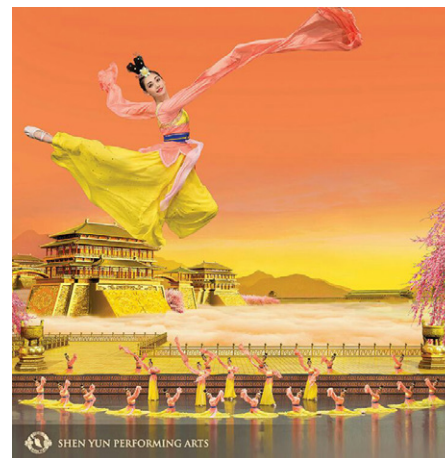
有着一百年历史的非营利组织底特律大都会国际研究中心，其全球教育总监纳达·戴格姆妮女士，因致力于发展教育计划而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她在观看了2019年3月1日底特律的首场神韵演出之后说：“神韵绝对美丽！”“我在脸上发神韵的推文，告诉人们：不要错过神韵，当神韵来底特律时，你必须去观看，太美丽了！”

大陆观众感受神韵之美

2019年3月17日至3月31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韩国五个城市的11场巡回演出，反馈热烈。不仅吸引了当地主流民众，不少大陆民众慕名专程飞抵韩国观看。

大陆国企老板高明（化名）六次追看神韵，他说：“每一次的内容都有变化，看了六次神韵了，还是觉得很好看，有内心获得提升的一种满足感。”

从事科研的黄善（化名）专程到韩国看神韵，他表示，神韵演出传递的“敬天重德”的价值观让他很感动，发人深省。“冥冥之中肯定有神的存在，我时刻会约束自己的言行，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绝对相信因果报应。”他并期盼，“希望神韵能早日到中国演出。”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电脑版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
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了解更多真相，请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2019年5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总督岛举行排字活动，排出巨型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大字，场景壮观。民众赞叹：“蓝天白云，黄衫绿草，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互相映衬，美得绝无仅有！”